

# 语言文字与革命动员： “杨萧三谕”与《讨满洲檄》比较

李莹 李玉

---

**【提要】** 太平天国运动与辛亥革命乃清末“反满”色彩最为浓烈的两次革命，其动员文本蕴含着浓厚的政治语言特征。以太平军之“杨萧三谕”与同盟会之《讨满洲檄》相较可见，双方均强调夷夏之辨，但其历史观与立论依据截然不同：前者奉“上帝”为中国之缔造者，并以基督教教义为立论基础；后者则尊黄帝为始祖，以三民主义为核心。就表达逻辑而言，两组檄文皆继承了传统檄文“罪彼扬己”的基本框架，然后者更为理性，在逻辑链条的建构中加入了以往革命运动经验教训的反思。而从措词、修辞及文风、语气等语言技巧方面来看，两组檄文皆长于辞章之术，其中“杨萧三谕”不无“诬过其虐”之嫌，《讨满洲檄》则注重“征验”，讲究理性。是以从语言学角度重申两份檄文，可见文字本身即具有革命动员的功能，而语言技术水平的高下则会影响其功能的发挥。不过，两组檄文的语义又有明显的相关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近代革命思想发展的轨迹。

**【关键词】** “杨萧三谕” 《讨满洲檄》 革命动员 语言文字

---

## 一、问题的提出

晚清以来，各式各样的革命留下了诸多动员文本，如布告、檄文、口号、标语、宣传册、报纸、书刊、歌曲等，直观地显示了革命者的思想旨趣及其表现形式，以及革命动员的内容与策略，较易引起研究者的兴趣。以往学界对革命动员的考察，多侧重动员的思想与文化、策略与方式、过程与效果等，且对这些问题的追问与解释已成革命史研究的一种常见路径。其长处在于容易建构起动员者与受众之间的联系，有助于考察革命动员的宏观面相、实际结果及其成败得失。

然而，这一学术理路比较注重文本生成后的传播过程、理论意义和实际影响，至于形成文本的语言技术，包括用语立意、组织架构、逻辑修辞，以及行文立意与时代语境的贴合度、文字水平与民众接受能力之间的势差等内容，却在无形中被忽视。这些内容不可谓不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到革命语言的接受度，甚至可能会对后来的历史产生关键影响。故此，拓展视域，转移理路，向文字本身寻绎革命动员的力量，就显得尤为必要。

语言文字之所以对革命动员非常重要，与语言作为社会传播主要媒介的性质有关。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反过来又会极大地影响后者，而这种影响主要通过语言的语义、语意及语艺来实现。语义是语言的抽象含义，指人产生的想象性思维与逻辑性推断，影响甚至形塑着人的理性认知；语意，指语言所表述的具象内涵，是语言文字的原本意思；而语艺就是语言的艺术性，体现在音韵节奏、修辞技巧、语气表达、行文逻辑等各个方面。对革命语言，特别是战斗檄文等

纲领性文件来说,三者的特征更为明显。从语言自身着眼,进行技术性解析,不仅有助于推进革命史研究范式的转换,而且对深化相关历史认识也有一定作用。尤其是革命动员文本的比较研究,在这些方面的效果可能更为明显。

作为晚清最重要的两次革命,太平天国运动和辛亥革命的动员文本固然很多,但1852年前后杨秀清、萧朝贵发布的《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以下统称“杨萧三谕”)<sup>①</sup>与1907年同盟会在《民报》增刊《天讨》上刊布的《讨满洲檄》无疑是各自的代表性文本。两者均为檄文,是革命动员中最具有战斗力的文体,故可作为革命动员文本比较研究的恰当案例。

然而,目前学界对这两次革命动员的研究多是“各自为战”。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革命动员,学界较为关注其文书中宣扬的“反满”、崇拜“上帝”等思想,侧重解读洪秀全等人如何利用宗教思想动员民众,近来也有一些学者专门考察太平天国革命动员的宣传策略与技术。<sup>②</sup>至于“杨萧三谕”,虽已有不少相关成果问世,但就内容而言,或是考证其颁布时间、版本源流;或是立足舆论战的角度,审视其与曾国藩《讨粤匪檄》的对立效果。<sup>③</sup>有关辛亥革命动员的研究也基本以活动考察、思想分析、心态探究为主。<sup>④</sup>具体到《讨满洲檄》,学界的专门考察不多,有学者将其作为同盟会“反满”革命策略之一进行探讨,以窥探同盟会的反清思想。<sup>⑤</sup>而关于“杨萧三谕”与《讨满洲檄》的比较研究,尚未

- ① 据吴善中考证,《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于太平天国辛开元年(清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底初颁于永安,而《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则是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清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上半年发布于永安或从永安向湖南道州、江华等地的进军途中。参见吴善中《太平天国三篇檄文初颁时间考》,《广西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 ② 基于宗教思想层面的分析,如罗尔纲在整理太平天国运动相关文选的过程中指出,《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痛述清朝统治者压迫汉族的种种罪恶,以鼓舞革命义愤”,另外两篇檄文则是“从宗教的说法导出反清革命理论”,参见罗尔纲编注《太平天国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3—83页;陈恭禄《太平天国历史论丛》,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2—201页;夏春涛《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2—265页;王庆成《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5—264页。基于“反满”思想视角的研究,参见姜涛《关于太平天国的“反满”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编《清代满汉关系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07—417页;陆仰渊《太平天国的前期政治纲领〈奉天讨胡檄〉》,朱庆葆主编《太平天国及晚清社会研究》(2017年总第1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6—60页,等等。基于宣传策略与技术视角的分析,参见朱从兵《太平天国文书制度再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81—335页;马寒霏《太平天国宣传转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大学,2016年;吴茜《太平天国宣传策略的流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大学,2020年。此外,还有学者从公文视角讨论了太平天国文书的特征,参见王舒雅《太平天国公文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1—111、150—199页。
- ③ 以考证为主的著述,参见张铁宝《梁启超是抄录太平天国印书回国的第一人》,《学术月刊》1988年第6期;吴善中《太平天国三篇檄文初颁时间考》,《广西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基于檄文舆论战视角进行的研究,参见李丹《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舆论战——浅析太平天国时期的四篇檄文》,《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姜涛《关于太平天国的反满问题》,《清史研究》2011年第1期;李志茗《天父天兄之教与名教之争——〈奉天讨胡檄〉与〈讨粤匪檄〉比较研究》,《福建论坛》2012年第4期;董丛林《“杨萧三谕”与〈讨粤匪檄〉比较论》,《河北学刊》2016年第3期;孙光耀《从〈讨粤匪檄〉看曾国藩对太平天国的舆论反击》,《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周嘉豪《“夷夏之辨”还是“卫道护统”:以两篇檄文的争夺为例》,《文学教育》2019年第10期。
- ④ 章开沅主要从“排满”意识出发,解释革命党人的动员思想,参见章开沅《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动员——以“排满”宣传为实例》,《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5期;谭徐锋注意到孙中山通过即兴式的口头宣讲、面对面的个别谈话等方式进行革命动员,参见谭徐锋《清末革命知识的制作与流动》,《清华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还有学者注意到白话文、报刊及新闻知识分子在辛亥革命动员中的作用,参见靳志朋《民众动员与话语变革——辛亥革命时期的白话文》,《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付登舟《〈大江报〉与辛亥革命的舆论动员》,《江汉论坛》2014年第9期;付登舟《胡石庵与辛亥革命前后舆论动员》,《湖北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等。
- ⑤ 张昭军《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人的民众动员策略与种族心态——以三份〈讨满洲檄〉的文本为讨论中心》,《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第2期。

见专题成果,仅见相关学者在论及近代“反满”思想的发展过程时,会以这两组檄文为底本,讨论后者对前者的某种继承关系。<sup>①</sup>

由上可见,尽管学界对于太平天国运动和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早已成果斐然,关于两者革命动员策略与效果的讨论,也早已不是一个小众话题,但政治语言在这两次革命的檄文中如何发挥作用,即所谓“文字本身的力量”,值得进一步认识。故此,本文拟从语言学的视角切入,通过剖析两份檄文的“立意”“立论”及“立言”技术,来诠释文字之于革命动员的功用,以期加深对晚清两次革命之动员的丰富内涵与复杂效果的认知。

## 二、从“赋魅”到“祛魅”:历史观与立论依据

行文以立意为先,“意”立“气”行,檄文方可令人信服,革命才能师出有名,名正言顺。而“意”要立得稳、立得正,就必需有恰当和充分的论据。虽同样意在推翻清政府,但“杨萧三谕”和《讨满洲檄》的立意旨趣与立论依据不尽相同。前者体现了宗教和神话的特色,后者则突出民族历史的底色。

对“杨萧三谕”而言,从宗教和神话两方面解释历史源头,说明满洲“非我族类”,乃其全文基调。洪秀全早年科举不利,转而信奉基督教,并创立了融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于一体的上帝教,太平天国运动的动员文本表意因而充满了宗教色彩。“杨萧三谕”之《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以下简称《奉天讨胡檄》)开篇便提出“上帝之天下”与“满洲之天下”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将民众视为“上帝”之子,以此与“满洲”相区别;并强调“上帝”乃中国之根源,“名中国为神州者何?天父皇上帝,真人也,天地山海,是所造成,故从前以‘神州’名中国”。<sup>②</sup>而《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则详细指出“天父皇上帝”乃“当初六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是掌握一切、权能无边无际的神人,而“天下万国,俱有记及皇上帝之权能”。<sup>③</sup>在《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中,杨秀清等人直接警示民众注意自己的身份来源,将“上帝”嵌入民众意识当中,宣称“尔等尽是上帝子女”,“尔等肉身,是尔凡肉父母所生;尔等灵魂,是上帝所生。上帝是本军师亲爷,亦是尔等亲爷,又亦是天下万国人民亲爷”。<sup>④</sup>三份文本的叙述可谓是相互配合、相辅相成。“杨萧三谕”还有意刻画“中国”与“胡虏”之对立,如“夫中国,首也;胡虏,足也。中国,神州也;胡虏,妖人也”,<sup>⑤</sup>给人留下两相敌对之感;并称“细查满鞑子之始末,其祖宗乃一白狐、一赤狗,交媾成精,遂产妖人,种类日滋,自相配合,并无人伦风化”。<sup>⑥</sup>从中可见太平军对“满洲”身份的定位及其对其历史来源的解释其实存在一定的虚构成分,但文内“神州”“父母”“亲爷”“皇上帝”等词汇又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体制色彩,具有中西杂糅、政教结合的特征。<sup>⑦</sup>檄文如此表述,最终目的在于凸显“中国”与“满洲”的区隔,从而解构清政府的合法性。

在此基础上,“杨萧三谕”将立论依据建立在基督教教义之上,通过“上帝”信仰形塑革命的正当

① 如有学者认为,太平天国运动为孙中山等人提供了一条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思路,从而肯定两次革命之间“反满”的连续性。参见刘小萌《太平天国与“反满”——从“严种族之见”谈起》,《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

②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5页。

③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07页。

④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08—109页。

⑤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05页。

⑥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06页。

⑦ 夏春涛有关太平天国上帝教教义的研究即指出其存在明显的中西合璧、政教合一特征。参见夏春涛《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第76页。

性与行动的合法性,并以“上帝”权威统摄全文。据统计,“杨萧三谕”共提及“上帝”40次。在其论述中,不仅“中国”创始于“上帝”,太平天国之王王的权力来源于“上帝”,兴兵“讨满”亦是为了“上帝”。<sup>①</sup>在《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中,太平军极力塑造“上帝”高于一切、支配一切的形象,细述“上帝”自造有天地以来,发怒数次,皆关涉天下兴亡,且其“今次又大怒”,遂“遣天使接天王升天命诛妖,复差天王作主救人”。<sup>②</sup>《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则宣扬“上帝”对民众的怜悯,解释“今天父上主皇上帝”是因“恩怜凡人中魔鬼毒计”,<sup>③</sup>才差遣天王来拯救万民,从而为太平军起义反清制造充足的论据。与之相对应,“杨萧三谕”中还频繁提及“中国”达48次,且“上帝”与“中国”两词往往联结于一体,突出两者之间的主客体关系。

此外,与“上帝”崇拜相配合的还有鬼神观。檄文指出,正是由于“满清”统治中国,才引得“妖胡虐焰燔苍穹,淫毒秽宸极,腥风播于四海,妖气惨于五胡”;<sup>④</sup>“胡虏为妖人者何?蛇魔,邪鬼也,惟鞑靶妖胡实敬拜之,故当今以妖人目胡虏也。奈何足反加首,妖人反盗神州,驱我中国悉变妖魔也”。<sup>⑤</sup>太平军还将一切与“上帝”不同的民间信仰对象,即民众“所拜祭各菩萨偶像”,均视作“蛇魔红眼睛阎罗妖之妖徒鬼卒也”,<sup>⑥</sup>从而排斥一切其他民间信仰,为“上帝”崇拜扫除异己。

相形之下,《讨满洲檄》的立意则显得比较理性,所表达的历史观与前者完全不同。同盟会视黄帝为中国始祖,“昔我皇祖黄帝轩辕氏,与炎黄同胞出于少典之裔,实建国于兹土。”<sup>⑦</sup>至于满族,同盟会上溯其族史,直指其祖先原与华夏各族乃不同地域的两个主体,其占据中国的历史,要追溯至明朝万历年间。彼时努尔哈赤“盗我旁部”,并“黄衣称帝”;其子皇太极又趁明末中国内乱,“因袭便利,入据全辽”;又有“多尔袞福临父子,假称义师,盗有中夏”。<sup>⑧</sup>这一表述的内在含义是为了从历史的维度证明清政府统治中国本质上是一种外族入侵,而同盟会通过革命推翻“满清”政府,正是为了“恢复中华”。

同盟会从这一历史观中延展出的立论依据,与太平军相比也淡化了信仰、鬼神等元素的色彩,接纳了诸多西方民主政治元素,希望在反对清政府专制统治的基础上实行种族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家。换言之,《讨满洲檄》的批判武器,乃是晚清以来日渐流行的西方民主理论。檄文中多次提到“民气”“立宪”“国民”“中华种族”“新学”“泰西文明”“共和”“均土”“社会革命”等新式词汇;涉及对清政府的叙述则多是“帝制”“独裁”等,意在以西方先进民族民主理论来推进对封建专制之清王朝的解构与批判。尤其是当清政府试图实行包括预备立宪在内的“新政”时,同盟会洞烛其奸,揭开其虚伪本质,“今者民气发扬,黎献参会,虏亦岌岌不遑自保。乃以立宪改官之令,诱我汉民,阳示仁义,包藏祸心,专任胡人,死相撑拒”,<sup>⑨</sup>指明清政府的所谓“立宪”根本上还是维护帝制和“满洲”贵族的利益,只有同盟会的革命才是真正的旨在实行民主共和政治。

进一步讲,《讨满洲檄》表达的核心思想,正是孙中山提出的十六字纲领。檄文明确指出“自盟

①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06—107页。

②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07页。

③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09页。

④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04—105页。

⑤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05页。

⑥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09页。

⑦ 军政府《讨满洲檄》,《天讨》1907年4月25日。

⑧ 军政府《讨满洲檄》,《天讨》1907年4月25日。

⑨ 军政府《讨满洲檄》,《天讨》1907年4月25日。

以后,当扫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有渝此盟,四万万人共击之。”<sup>①</sup>该纲领原系孙中山在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提出,檄文加以宣示,乃为革命动员树旗立帜,也为檄文“塑魂”,既为同盟会的革命实践提供理论,亦为革命明确目标。十六字纲领构成了檄文的核心句、主旨句,具有画龙点睛和总领檄文的作用。

综上可见,在立意层面,“杨萧三谕”全文充满基督教思想,并将其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借此建构对“中国”和“满洲”历史的认识,意图将中国改造成崇拜“上帝”和基督教文化的国家,为革命动员“赋魅”。《讨满洲檄》则推崇民主理论,并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立性,俾既适应民主共和的政治企求,又契合进行种族革命的社会语境。相较于前者的“赋魅”色彩而言,同盟会及其《讨满洲檄》无疑表现出非常明显的“祛魅”特征。当然,《讨满洲檄》有较为明显的理想指引,即文中宣示同盟会十六字纲领中的“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尤其是“民国”的概念,意指从数千年的“君主国”向“民主共和国”过渡,意味着中国政治体制前所未有的改变,也表征着革命党人对中国政治文化和革命道路前所未有的创新性探索。这一政治建设蓝图辅之以“平均地权”的社会建设方案,使檄文描绘出一个理想的政治与社会远景,其性质大不同于“杨萧三谕”。

### 三、“罪彼扬己”:行文的表达逻辑

檄文的表达一般包括如下几项基础性元素:一是列举自身的观点;二是揭露对手方的罪行;三是呼吁、号召参与行动;四是说明奖惩办法;五是申明态度,告知天下。<sup>②</sup>由此,形成檄文的逻辑结构。而檄文只有逻辑严密,才能主旨突出,论证有力,扩大动员效果。

以“杨萧三谕”中较具代表性的《奉天讨胡檄》来看,开篇第一段便明确区分“上帝”与“胡虏”、“中国”与“满洲”之间的区别,提出“中国”正被“胡虏”统治,陷于一片混乱,而国人却不自知。<sup>③</sup>第二段列举“妖魔满清”占据“中国”后所犯罪行,主要包括:变中国之形象、坏中国之衣冠、乱中国之人伦、污辱中国女子、以妖魔条律毁坏中国法制、更改中国之语言、毫不怜恤受灾百姓、纵贪官污吏剥民脂膏、官员腐败、对有二心者赶尽杀绝十条罪状。<sup>④</sup>从而给人强烈的冲击之感,使革命师出有名,正当性更为充盈。

接着,在檄文第三段,太平军又以姚弋仲、苻融之例反衬“满清”的罪恶,号召民众必须学习文天祥、谢枋反元,史可法、瞿式耜反清的精神,从而强化反清先驱的榜样作用,增强推翻清政府的历史论据。<sup>⑤</sup>第四段檄文则径直提出革命时机已到,所谓“三七之妖运告终”“胡虏有必灭之征”,因此“我天王”才奉命起义,以“扫除妖孽,廓清中夏”。檄文特别强调“恭行天罚”,指出义师兴起之后,不响应与不参与者将分别受到“天罚”,从而增加对民众的裹挟作用。檄文最后再次强调太平军兴起义师乃“上为上帝报瞒天之讎,下为天国解下首之苦”,惟其如此方能“肃清胡氛,同享太平之乐”。<sup>⑥</sup>

从《奉天讨胡檄》的文本,可见其表达逻辑既有因果阐述,又有递进层次。该檄文首先旗帜鲜明

① 军政府《讨满洲檄》,《天讨》1907年4月25日。

② 胡元德《文字何以成为武器?——檄文战斗力解码》,《齐鲁学刊》2015年第1期。

③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04—105页。

④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04—110页。

⑤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05—106页。

⑥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06—107页。

地提出“夷夏”之别和“中国”被“满洲”统治的现状,奠定全文的批判性基调;进而详述“满洲”所犯罪行,澄明革命原因;紧接着,檄文号召民众加入起义,是为动员与宣告;最后则提出时机已到,并说明奖惩,总结呼告,使读者层层深入到革命的现实逻辑之中。而《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和《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与《奉天讨胡檄》大致相仿,有不少内容是对《奉天讨胡檄》提到的“上帝”与“胡虏”有别、“满洲妖人说”、起义军受“上帝”之权、成败赏罚制约等问题的延伸性解说。

相形之下,《讨满洲檄》也运用了类似的表达逻辑。檄文一开始即用大量篇幅叙述中国历史的演进过程,上自黄帝,下迄清末,以证明“满清”建立起的统治实乃外族“盗窃中国”的结果,并非出自“正统”。<sup>①</sup>接着,该檄文详述“满清”向“我中华国民”所犯十四款罪行,并号召民众悉心以听。<sup>②</sup>这十四条罪状虽与《奉天讨胡檄》共通之处甚多,但也新增了清政府囤积物资于辽东、设警察制度以利虚名、焚毁书籍和创文字狱、不问台湾与南洋侨民死活等“罪行”,进一步“坐实”清政府失德之处,使叙述更加丰满有力。既然革命师出有名,同盟会进而梳理此前反清起义的先例,并以此为榜样,呼吁“我国民伯叔兄弟”洞察清政府之虚伪与阴险,“奋起逐北,摧其巢穴,以为中华种族请命”,并顺势提出同盟会的革命宣言,即孙中山十六字纲领。<sup>③</sup>继之,《讨满洲檄》理性地指出以往革命的不可取之处,对太平天国仍旧“定于一尊”的做法及义和团崇信妖言与一意仇外的态度,均进行了检讨,言明以往革命中这些盲目过激与倒退之举均不可效仿。<sup>④</sup>最后,《讨满洲檄》分析了革命成败的制约,分别叙述了对“幡然悔悟者”“为虏效忠者”、充当“间谍者”,以及“满洲胡人愿归部落者、愿留中国者”的处置办法,进而号召天下,共谋革命大业,光复中华文明。<sup>⑤</sup>

《讨满洲檄》虽然与“杨萧三谕”有较为相似的表达逻辑,但两者在篇幅结构和逻辑设计上有较大不同。一是有关“中国”和“满洲”的历史叙述存在明显差别。前者以不长的篇幅罗列“上帝”与“胡虏”之别,以明确“夷夏之辨”,更倾向于刻画“上帝”和“太平军”的由来及其与民众之间拯救与被拯救的关系,从而形塑民众的认同。同盟会则运用大量的篇幅回顾与诠释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并抓住关键历史节点,以历史事实言明中国以汉族为正统,以及“满清”破坏正统并“窃据中国”的过程,使革命的历史依据更为充盈,自然而然地令读者融入“夷夏有别”的意识当中。在列举“满清罪状”时,同盟会所举之例亦可考可证,且辅之以列举数字的描写形式,使檄文更具说服力。

二是两者的逻辑环节设计,亦即叙述结构有所不同。《奉天讨胡檄》全篇按照一般檄文的写作逻辑,将“夷夏之别”“讨伐满洲罪状”、宣告动员、表明奖惩、总结呼告五部分连贯整合而来,并无其他要素说明。《讨满洲檄》在进入号召动员环节之前,则嵌入了对以往革命的认识和评价,借此提出革命应当持谨慎态度的地方,即除了学习、传承以往的革命精神之外,更重要的是对其进行反思与检讨,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也就是说,在《讨满洲檄》的文本中,作者还着重思考了应当如何革命,如何避免革命失败等问题。其检讨的恰恰为太平天国运动中的过激之处,因而具有一般檄文中所不具有的理性成分。

综上所述,两份檄文构建的论证逻辑大致相符,均延续了传统檄文“罪彼扬己”的基本框架。而《讨满洲檄》的表达逻辑中添加了反思以往革命成败利钝的内容,使得整篇檄文内涵更加丰富,逻辑

① 军政府《讨满洲檄》,《天讨》1907年4月25日。

② 军政府《讨满洲檄》,《天讨》1907年4月25日。

③ 军政府《讨满洲檄》,《天讨》1907年4月25日。

④ 军政府《讨满洲檄》,《天讨》1907年4月25日。

⑤ 军政府《讨满洲檄》,《天讨》1907年4月25日。

实证性进一步提升,较易使民众提高对革命的认同与信心,也凸显出同盟会乃立足于民族历史与社会实际而探索革命理论,并进行社会动员。更为重要的是,同盟会并没有停留于为“中华”“复仇”的表述,而是在理性分析论证革命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需要的前提下,提出全新的革命与建设目标。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使《讨满洲檄》的中心思想更加明确,革命指导性更强,也使该檄文无论是“罪彼”还是“扬己”的作用均比“杨萧三谕”更进一步。

#### 四、“诬过其虐”与“征验甚明”:文字和语言技术的应用

对檄文而言,除立意与逻辑至关重要外,文中的措词、修辞与句法等,皆有可能影响读者观感。欲使读者最大限度地接受檄文所要表达的思想,或潜移默化地受其影响,理当字斟句酌,讲究文法,从而构成檄文的“语艺”特征。由于作者身份背景、文化认同与思想基色的差异,“杨萧三谕”和《讨满洲檄》在措词、修辞、文风和语气方面有明显的差别。<sup>①</sup>

##### (一) 措词

词语是语言建筑中的基础材料,它又可分为不同的词性。为增进对“杨萧三谕”和《讨满洲檄》在用词方面的比较,有必要依词性加以考察。在人称使用方面,“杨萧三谕”兼用代词与名词,其所用第一人称包括“本军师”“我”,第二人称则是“尔等”,指向一般读者,给人直接对话之感。涉及清政府的称谓时,“杨萧三谕”对其进行了角色化的加工,如“妖胡”“胡虏”“满洲妖魔”“狗鞑子”“蛇魔”“妖徒鬼卒”“魔鬼”“难看恶鬼”“邪鬼”“羯狗”“骚狐”等,充满贬义色彩。其中许多词语是由“形容词+名词”的形式构成,渲染程度至深,可谓极尽丑化与妖魔化,表现出明显的“敌—我”对立特征。在描述清政府统治行为方面,檄文则大量使用“盗据”“肆毒”“混乱”“霸占”等表述犯罪的动词,用以表达“满清”侵占并统治“中国”的非法性及其对“中国”造成的危害,以利宣示太平天国运动的政治立场。

除了实词之外,虚词在檄文中的作用也不可忽视。“杨萧三谕”中的虚词常见诸句末,兹举一例:

予惟天下者,上帝之天下,非胡虏之天下也;衣食者,上帝之衣食,非胡虏之衣食也;子女民人者,上帝之子女民人,非胡虏之子女民人也……中国之人,反低首下心,甘为臣仆,甚矣哉!中国之无人也!<sup>②</sup>

“者”置于主语后,起到说明作用,引出后文的判断,强调“上帝”的绝对权威。“也”表示肯定,体现了太平军对“满洲”占据“中国”和“中国”臣服于“满洲”之事实的坚定叙说。“矣”“哉”二字则表示感叹语气,修饰“甚”,形容程度之深。虚词虽不具有实际意涵,但能加强语气,增强檄文的感染力。

而在《讨满洲檄》中,第一人称“我”的运用较多,如“我皇祖黄帝轩辕氏”“我子孙黎民”“我中华”“我政府”“我大国”等,特别是“我国民伯叔兄弟”,表明同盟会与民众的共容性与一体化,有益于

<sup>①</sup> “杨萧三谕”以东西天王杨秀清与萧朝贵的名义发布,二人均为农民出身,其文化程度不言而喻。《讨满洲檄》虽以“军政府”名义发表,但实际由晚清著名的经学大师章太炎执笔,其长于写作,著述丰富,精通国学,同时又对西学颇为推崇,故其行文笔酣墨饱,遣词造句,颇为讲究。另有一说认为,《讨满洲檄》作者是章太炎的弟子黄侃。本文无意追究其作者究竟何人,故暂取学界流行说法,但无论是章太炎还是黄侃,均为文化水平较高的知识阶层,与杨秀清、萧朝贵等农民知识分子不同。

<sup>②</sup>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04页。

拉近两者之间的情感距离。涉及对清政府统治者的称呼,同盟会多持理性态度,直呼其名,如“多尔衮”“玄烨”“爱新觉罗氏”“满洲”,为表对立,至多称之为“虏”或“逆胡”,污辱性称谓较少。不过,《讨满洲檄》运用了诸多生僻字,这些字或有特殊指意,或出自深奥的典故,如“旅獒”“邱墟”“蘗芽”“鲸鲵”“外嬖”“苞苴”“维縶”“怨恚”“湛溺”“箫勺群慝”等,固然显示出一定的文采,但对文化水平有限的一般民众而言,存在认知和理解上的困难,其动员效果抑或因此而受限。至于虚词的应用,《讨满洲檄》与“杨萧三谕”相差不大,多起到增强语气的作用,此不赘言。

## (二) 修辞

作为一种语法手段,修辞或可增加文采,提高渲染力;或可增强论据效果,提高文字战斗力。刘勰认为,檄文写作应当“气盛而辞断”,即运用各种修辞手法使文章富有气势,以增强其渲染力与鼓动性。<sup>①</sup>“杨萧三谕”和《讨满洲檄》均注重修辞手法,兹分别举例于下表。

表1 “杨萧三谕”与《讨满洲檄》修辞手法使用情况一览

“杨萧三谕”		《讨满洲檄》	
修辞	例句	修辞	例句
用典	昔文天祥、谢枋得誓死不事元,史可法、瞿式耜誓死不事清。	比喻	部落聚居,胜兵稀疏,亦财比于藜芥。
夸张	罄南山之竹简,写不尽满地之淫污;决东海之波涛,洗不净弥天之罪孽。	用典、排比	朱一贵起于台湾,林清起于山东,王三槐起于四川,洪秀全起于广西,张乐行起于河南。
复句排比	夫中国有中国之形像,今满洲悉削发为禽兽……中国有中国之人伦,前伪妖康熙暗使鞑子一人管理十家,淫乱中国之女子,是使中国之人尽为胡种也。	用典、警策	惟太平洪王之兴,则又定一尊于天王,烧夷神社,震惊孔庙,遂令士民怨恚,为虏先驱。惟是二者,则不可以崇效。
对仗	甲冑干戈,载义声以生色;夫妇女,撼公愤以前驱。	对仗	多尔衮以盗嫂为美谈,玄烨以淫妹为法制。
反问	溯自皇上帝造有天地以来,皇上帝大发威怒屡矣。尔世人还未知乎?	反问	有不寝苦枕块,挟弓而斗者,当何以为黄帝之子?
引用	据《旧遗诏圣书》,天父皇上帝当初六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皇上帝是神爷。	呼告	呜呼!我中华民国伯叔兄弟诸姊妹,谁无父母,谁非同气,以东胡群兽,盗我息壤,我先帝先王,亦既丧其血食。
示现	皇上帝第一次大怒,连降四十日四十夜大雨,洪水横流矣。	用典、对比	昔拓跋氏窃号于洛,伐北群胡,犹不敢陵轶汉族;虏以要害之地,建立驻防,编户齐民,步供甲米,是有主奴之分。
设问	且问皇上帝何怒?乃怒世人拜邪神,行邪事,大犯天条者也。	比拟	诚以豺狼之族,不可不除,腥臊之气,不可不涤。
反复、呼告	好醒矣!好醒矣!顺天者存矣!逆天者亡矣!	对比、起兴	夫以黄神遗胄,秉性淑灵,齐州天府,世食旧德;而逆胡一入,奄然荡覆,又其腥闻虐政,著在耳目,凡有血气,宜不与戴日月,而共四海。

由上可见,“杨萧三谕”与《讨满洲檄》运用的修辞手法都比较丰富,有助于增强檄文的节奏感和说服力。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两份檄文皆注重用典,但前者除征引中国历史名人和典故外,对“皇上帝”、耶稣等的形象和行为亦多有着墨,尤其是有关“皇上帝”的叙述贯穿全文,突出其对太平天国的引导作用,因而具有较为浓厚的宗教色彩。《讨满洲檄》则细致爬梳中国历史,列举了诸如庄廷鑑、戴

<sup>①</sup>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6页。



名世、吕留良、查嗣庭、陆生楠、汪景祺、齐周华、王钦侯、胡中藻、朱一贵、林清、王三槐、张乐行等诸多历史人物或事迹,以增强论据;檄文开篇对中国历史的排比叙述及历史典故的串联引用,不仅反映了檄文作者高超的语言组织能力,亦彰显了其丰厚的历史知识素养,有助于强化民族主义叙述效果,因而有利于同盟会革命理论的社会宣传。

出于农民知识分子之手的“杨萧三谕”虽然能借用多种修辞提升文采,增强语势,总体效果却不能与《讨满洲檄》相提并论,况且檄文中还有一些修辞应用失当、渲染过度的表述,如污蔑“满洲”始祖“乃一白狐一赤狗交媾成精,遂产妖人”等,不易令人信服。檄文之战斗力应建立在论证有据、逻辑严密、入情入理的基础之上,修辞手法只不过起到“催化剂”的作用,若使用不当,反而会影响甚至削弱檄文的宣传效果。

### (三) 文风、语气

文风就是行文的整体风格,是作者艺术风格与思想倾向的反映。文风与语气联系密切,所谓语气指说话或行文的口气,不仅反映了作者的情感强弱,而且暗含着作者对言说对象的态度,是作者实现与读者情感联系的一种特殊渠道。

“杨萧三谕”文风急促,语气激愤,立场鲜明,充满祈使与诬蔑口吻。其句型复杂多变,除《奉天讨胡檄》语句较显规整外,另外两篇肯定句、感叹句、反问句、设问句、呼告句等相互交错,且长短句交叉,语调以高升为主,表现出丰富而强烈的情感色彩。行文虽有平仄之韵,但整体节奏感不强。许多句子带有命令式、辱骂性的语气,甚至不乏诸多口语化的成分,如“尔等果有灵心未死,将此等俗语静想,亦可以翻然醒悟追悔。丢了亲爷莫大之罪;且中了仇敌诡计,后来坠入地狱沉沦,听魔鬼淫污,狗咁贱,贱过狗矣”等表述,甚至暗含有要挟民众之意。三篇檄文还多以“我”告知“尔等”民众的语气展开,将太平军居于高位,民众则皆被视为需拯救的弱势群体,隐含强弱对立、上下分隔之意,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民众认同感的塑造。

相较而言,《讨满洲檄》理性成分较多。文中语句多为陈述句,语调以平直为主,表现出坚定、客观的语势,由内而外地显示出语言的说服力。檄文句型以四言为主,不仅形式规整,言简意赅,而且读来朗朗上口,条理突出;且对仗句使用广泛,如“疆域之广,不逮汉家;挾伐所及,远踰宋氏;辨章种族,严于有唐”,语气铿锵有力,富有节奏感和音韵美。另外,该檄文中极少出现辱骂性和口语化的语句,虽同样意在动员民众情绪,但并无过激语言,全文论证有序,娓娓道来,从总体上凸显严谨有序、严正理性的文风与语气特点。

整体看来,“杨萧三谕”遣词造句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对清政府“诬过其虐”之处甚多。虽然檄文的语言风格比较朴实,但内容杂糅,文风较为零乱,难以为训。《讨满洲檄》则引经据典,修辞技法运用自如,论述注重“征验”,强调逻辑推演与实证分析,从而使其在革命动员的理论建构和社会认同层面,都能得“青出于蓝”之效。这不仅归因于檄文创作者知识结构的演进与文化水平的提升,亦与中国近代革命形势的变化及革命理论的发展、革命路径的转变有直接关系。

## 结 语

檄文作为一种纲领性的宣言或文告,是“文战”最主要的武器之一。衡量檄文的动员力,除考察文本生成后的传播方式、途径与范围之外,檄文的立意、逻辑与表达技巧等语言与文字层面的内容,

亦不可忽视。

应当承认,作为太平军的革命动员纲领,“杨萧三谕”的行文技艺在动员民众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三篇檄文通篇语势激昂,语句急促,语气犀利,虽然表现出强烈的“诬过其虐”色彩,却能最大限度地煽动反清情绪,文中通俗化和大众化的表述亦有助于其在底层民众之间广泛传播。<sup>①</sup>加之,太平军善于“借力”,以宗教为外衣,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进行革命动员,便于使民众被迅速集中于一个明确的纲领之下。<sup>②</sup>1852年太平军在挺进湖南的过程中到处张贴“杨萧三谕”这几篇重要檄文和其他“斩胡诛妖”的告示,提高了民众的响应程度,太平军的队伍迅速壮大。楚勇领导者江忠源说:“乃自入永州境,土匪之迎降,会匪之入党,日以千计。”<sup>③</sup>据李秀成回忆,当时“招得湖南道州、江华、永明之众,足有两万之数”。<sup>④</sup>据罗尔纲统计,太平军于湘南共吸收天地会五万多人,人数相当于他们入湖南前的十倍。<sup>⑤</sup>至1853年1月太平军攻克武昌后,队伍扩大到50万,攻克南京后更号称百万。从金田起义到1853年初仅两年三个月,太平军“就席卷长江,截断了清朝的漕运,控制了中国的心脏地区。革命形势在飞跃地发展”。<sup>⑥</sup>由此而言,太平天国之所以能被迅速“运动”起来,固然有非常复杂的原因,但与“杨萧三谕”等太平天国文书宣示的革命纲领被民众认可,并起而响应,融入革命洪流不无关系。

不过,这一“高烈度”的革命虽然即时性效果显著,但从长远来看难以真正统合社会,取得成功。“杨萧三谕”假托基督教神学,宣扬“上帝”崇拜,以“满洲”人“由白狐与赤狗交媾而生”及“上帝发怒救世济人”等观点来证明其论断,实与历史和现实相去甚远。太平军这种将西方文化、宗教典故削足适履地套用于中国历史,批判儒家文化与中国传统民间信仰的做法,亦容易带来“矫枉过正”的结果,为对手方留下攻击的余地。曾国藩之《讨粤匪檄》即以此为着力点,抨击太平天国“窃外夷之绪,崇天主教”,使“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为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冠以借洋教破坏中国传统名教的罪名。<sup>⑦</sup>后来,太平军奠都南京,统治区域延展至数省,“天国”的理想部分得以实现,但最终由于内外双重因素影响走向衰落。特别是当太平军遭遇政治和军事危机后,其宗教大厦根基亦复不稳,原先被动员的民众并未将“天国”“上帝”等观念或信仰真正内化于心。这与太平军在革命动员文本中宣扬的理论与信仰,与后来其自身实际所行与所信之间的巨大落差,有很大的关联。<sup>⑧</sup>

相较而言,《讨满洲檄》虽文采飞扬,引经据典,但在词汇应用、典故援引等方面过于文学化、知识

① 陈恭禄也认为,这几篇檄文“内容比较简单,易为农民所掌握,也合于他们的知识水平”。参见陈恭禄《太平天国历史论丛》,第169页。

② 受阶级与条件制约,太平天国领导者借宗教起义,更如一种策略或手段,并非是创造“邪教”,因而无可厚非,不能质疑其正义性,也不能以后世眼光苛求前人。而且,这种策略能够迅速动员民众,反而有益于推动革命进程。参见夏春涛《太平天国宗教“邪教”说辩证》,《山西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③ 江忠源《答刘霞仙书》,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汇编》第11册,凤凰出版社2018年版,第4947页。

④ 李秀成《李秀成自述》,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90页。

⑤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60页。

⑥ 罗尔纲《太平天国前期飞跃发展的革命形势与纲领政策的颁布》,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史研究》第2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⑦ 曾国藩《讨粤匪檄》,唐浩明整理《曾国藩全集·诗文》第14册,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32—233页。

⑧ 对太平天国而言,宗教是一把双刃剑,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初期,宗教在动员层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当太平天国占据东南半壁、面临如何实施统治的问题时,上帝教便暴露出其不足的一面,最终导致由此所孕育出的宗教激情仅仅成为一种泡沫现象。参见夏春涛《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第106页。

化,于普通民众而言不免有距离感与疏离感,故其传播面实际不够“底层化”,檄文更多地是在知识阶层之间传播。在广大的贫苦农村地区,其接受度、传播度和影响力难以与“杨萧三谕”相比。加之清政府多方阻碍其传播,《天讨》在日本发刊后,国内虽竞相私下传阅,但未能立即在当时引爆革命的浪潮,亦未使革命在民众之间形成席卷之势,革命党人的行动仍多以秘密方式在局部进行。两次革命的领导主体、推进过程和革命性质有异,在革命动员的文本层面或许早已有所隐喻。

尽管语言技术高度知识化导致《讨满洲檄》传播力受限,但同盟会对“满清”的认识与批判及所宣扬的革命理念与目标,皆建立在相对理性的基础上,且与社会进步的大势合流,因而立即得到知识精英的响应,并具有长远的延时性效力。从横向维度看,《讨满洲檄》在国内诸省得到回应,檄文的精神具体分化至各个省份,产生了某种“在地化”效应,如江苏、河南、云南、四川、山东、直隶等省皆结合本省实情发布地方性的“讨满洲檄”或“革命书”,以示附和。从纵向维度审视,《讨满洲檄》的语言架构与表述模式亦成为后来之革命者的政治宣言底本,1911年10月云南新军起义时蔡锷公布的《滇军政府讨满洲檄》,基本脱胎于《讨满洲檄》。<sup>①</sup> 由此而言,《讨满洲檄》的影响力不完全是即时的,而是深刻地反映在更广阔的时空维度中。

还需说明的是,“杨萧三谕”和《讨满洲檄》之间虽然相隔时间甚远,但仍然存在内在的紧密关联,兼有连续性与超越性。具体来说,尽管檄文之间语言风格迥异,表达技术有别,革命的领导阶层及性质、过程与烈度等亦有所不同,但革命动员的思想有明显的相通性。孙中山就曾为太平天国正名,对其予以正面评价。<sup>②</sup> 《讨满洲檄》也提及“洪秀全起于广西”,乃是“义师”,应予效仿。不过,《讨满洲檄》亦提出,对于太平军“定一尊于天王,烧夷神社,震惊孔庙”等过激之举,不可崇效。进一步讲,在革命的目标方面,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等人追求建立“天国”,并以神教治之,但以孙中山等人为首的同盟会等革命党则提出建立“民国”的伟大构想,实行民主共和制,这就使得中国近代的民族民主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都被推向一个新的高度。<sup>③</sup>

(作者李莹,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李玉,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邮编:210023)  
(责任编辑:敖凯)  
(责任校对:尹媛萍)

① 参见潘先林、杨朝芳《〈滇军政府讨满洲檄〉相关问题论析——兼及〈孙文布告大汉同胞书〉》,《贵州民族研究》2013年第2期。  
② 夏春涛《太平天国再评价——金田起义170周年之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7期。  
③ 当然,太平军无法将革命推上民主、民权的高度,与其所处时代和阶级局限等诸多复杂的因素有关,不宜以后见之明去衡量太平天国与辛亥革命之间孰优孰劣,亦不能以当下的要求去苛求太平军。笔者仅意在指出,后者与前者相比确实有进步性,这也是中国近代革命发展进步的一种脉络。

# SUMMARY OF ARTICLES

##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Zhang Kaiyuan's Historiographical Thought // Ma Min**

Zhang Kaiyuan, the well-known Chinese historian who passed away not long ago, wa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Marxist historians cultivated in New China. His historical views and thought are worth summarizing. Apart from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studies and academic contributions, his historiographical thought entails four unique concepts and characteristics: the historical insight with “an outstanding ingenuity”, the comprehensive knowledge with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he morality of historiography with “a scholar personality”, and the historical sense with a poetic empathy. These four aspects are Zhang Kaiyuan's outstanding historical views as a historian that integrates ancient and modern historical thoughts at home and abroad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also a key to interpret his fruitful achievements in historical studies.

## **The Symphony of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How Sima Qian Successfully Achieved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nges from the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 Chen Qitai**

In the multi-level and multi-dimensional historical writing system of *the Historical Records (Shiji)*, how did Sima Qian successfully achieve the goal to “comprehend the changes from the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In this regard it is urgent for us to broaden our horizons and to innovate research methods creatively. Therefore, the following three features of his work need to be discussed in depth: (1) the *Basic Annals* are inclusive of the ancient and modern; (2) the *Chronological Tables* are designed in a unique and indigenous way; (3) the *Treatises* and the *Memoirs* are coordinated and related to the *Basic Annals* at multiple levels, and these various sections of the book are complementary to each another. In this way, we can better promote the understanding of Sima Qian's extraordinary creativity in historical thought and historiographical compilation, and obtain valuable enlightenment for further promoting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contemporary society.

## **Language and Revolutionary Mobiliz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ree Proclamations by Yang and Xiao” and *An Anti-Manchu Proclamation* // Li Ying, Li Yu**

The Taiping Rebellion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were the two most intense anti-Manchu revolution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ree Proclamations by Yang (Xiuqing) and Xiao (Chaogui)” (shortened as TPYX) by the Taiping army and *An Anti-Manchu Proclamation* (shortened as AAMP) by Tongmenghui (Chinese Revolutionary League), were crucial mobilization texts contained strong political language characteristics. Both texts emphasiz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barbarian tribes and China, but their historical views and the basis of their arguments were completely different. The former believed in “God” as the foundation of China and adopted Christian teachings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the latter paid tribute to the Yellow Emperor as the first ancestor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ook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as the core. As far as the logic of expression was concerned, the two groups of essays both inherited the basic framework of “promote oneself and crime against others” in official denunciation of the enemy in China's political tradition, but the logic of the latter is more rational, adding reflections on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from the failures of previous revolution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ogic chain. In terms of wording , rhetoric , style of writing , tone and other language skills , both documents were good at rhetorical skills. TPYX seemed to be “a bit excessive in stigmatization” , and *AAMP* solicited more rational evidence. Therefore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s , it can be seen that texts themselves had the function of revolutionary mobilization , while the level of linguistic sophistication would affect the degree and validity of their impact. At the same time , there was an obvious connection of semantics between these two documents , which to a certain extent reflected the genealogy of modern Chinese revolutionary thought.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Rural Governance between China and England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Yang Songtao**

To investigate rural governance of China and England in the 16th – 18th centu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comparison , we need to distinguish two levels of “regions above prefecture/county” and “regions below prefecture/county”. The counties in China and the countie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as the two units at the same level are comparable. Although their officials , namely county magistrates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justices of the peace in England , were different in the composition and operation of power , daily business to manage local affairs was by and large undertaken by village positions in both China and England. In Qing Dynasty , it was the rural securities ( Xiangbao , Jiazhang and Paitou) ; and in England it was parish constables. The origin , selection , appointment , operation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village chiefs were very similar. At the same time , the rural securities and parish constables were controlled by respective superiors. In the past , scholars attempted to seek differences in comparative studies. In the future , we may pivot to converg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 which shall be a promising scene.

###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Studies o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the Physiocratic School in the West // Zhang Hui**

The study of political thought of the Physiocratic school has experienced a historical process from obscure to clear , which is also a process of expansion from a monolithic to pluralistic interpretation. In the mid-to-late eighteenth century , the Physiocrats were constrained by the revolutionary context , and their political thought was often identified as absolutism or even despotism. By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 academic circles began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Physiocrat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public , the stability of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 and the progress of rational science , studies of the topic advanced as historians compiled historical data and conducted empirical research. After the end of the World War II ,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flourishing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 historians paid renewed attentions to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the physiocrats and argued that it contained a progressive element of promoting social changes. Since the 1970s , th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has encountered a crisis , and studies of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the Physiocrats have been enriched and developed with the revisionist historiography and have further been deepened under the rise of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in contemporary scholarly disciplines.

### **Women’s Liberation and Kemal Ataturk’s Reform: A Study of Women’s History in Turkey // Ding Yuting**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 nationalism , feminism , and Islamism have subsequently dominated the paradigms of the narratives of women’s history in Turkey.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se narrative paradigms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debate on and practice of the women’s issues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Women’s liberation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Kemalist reform , which ha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urkish women. However , in the different narrative paradigms of Turkish women’s history , scholars have not yet agreed on how to evaluate Kemalist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